

Перестройка、Гласность 與俄國的傳播發展

江慧婉

摘要

新聞媒體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一直扮演著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但過去在蘇聯卻沒有所謂的新聞自由；傳播媒體一直操縱在政府（亦即蘇聯共黨）的手中，成為宣傳政令、教條的工具。直到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政權推動「改造」（перестройка），執行「公開化」（гласность）政策，蘇聯人民似乎逐漸有「知的權利」。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後蘇聯解體，俄羅斯開始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蕭條，由於通貨膨脹，紙張與印刷費用提高，報紙頓然變成一般人無法負擔的奢侈品，電視取而代之成為主要的資訊管道。儘管前蘇聯共和國已各自獨立，但因相關設備、技術仍為政府壟斷，新聞媒體要真正發揮「第四權」的功能，仍需長期努力。

蘇聯時期的大眾傳播

依西方傳播學者的說法，現代傳播媒體應具備守望、決策、教育及娛樂四項社會功能。也就是說，現代傳播媒體負有傳達訊息、提供意見、教育大眾與娛樂大眾四大責任。然而對蘇聯政府而言，傳播是傳遞訊息與宣傳的一種方法，其主要任務是推動共黨意識、社會共識，以消除所有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

蘇聯的新聞媒體深受馬列思想影響，馬克斯認為傳播媒體是資本主義的再製品，經濟基礎決定其產物結構的形式。傳播媒體（當時指的是報紙與電報）於是成為普羅階級克服孤絕，團結為階級共同利益與改革而努力的重要方法。

列寧認為報紙不只是一個集體的宣傳和煽動者，也是一個集體的組織者。所以蘇聯的報紙成為教導強化馬列主義煽動群眾的工具。為了發揮布爾什維克媒體作為社會建設革命工具的最大功效，列寧於一九一七年提出幾點新聞從業人員的指導原則：

1) Партийность 黨性

列寧認為蘇聯新聞人員的首要原則為黨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與思想性(идейность)。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後開始蘇聯媒體就在這個原則下認同並服膺共黨與普羅階級，因此也只有黨組織、政府機關與公共組織（如工會）等機構團體才能經營媒體。

2)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客觀性

蘇聯媒體對客觀的定義不同於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新聞人員而言，客觀的意義是不以主觀同情態度來解析事實。記者應以馬列教義來報導事件，新聞人也深信唯有如此才合乎科學。

3) Народность 群眾性

Алфёров 認為如果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象徵新聞活動的意識與組織方針，那麼群眾性則揭示了大眾媒體的服務對象及訊息來源¹。

群眾性具有兩層意義：

¹ В. Н. Алфёров. *Воплощение ленинского принципа народности в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4, ст.6.

- i. 媒體應擴展群眾的視野與觀點，作為黨與民眾相互溝通的橋樑。因此俄國報紙具有二特點：讀者投書與農工派駐記者制度。這些特派記者負責地方監督、促進經濟，並避免官僚反制。
- ii. 藉助讀者投書使媒體成為“民意的風向球”。蘇聯每年有 6% 的人口回應報紙作讀者投書，從某些角度來看，蘇聯的媒體建立了一個雙向溝通的管道。

根據群眾性原則，蘇聯媒體在形式與結構上必須接近群眾並反映出黨定義的真實，所以蘇聯報紙常有正面的增產消息及相關經濟新聞報導，而這類報導常藉由生產方面的正面宣傳來彰顯國家的成功與進步。

4) Гласность 公開

列寧所指的公開有二：

- i.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報導蘇聯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卓越現象。
- ii. 為了成功的社會建設，對於社會、經濟的負面現象加以批評。

簡言之，馬列主義反對絕對而抽象的新聞自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保障的是布爾喬亞的新聞自由。而蘇聯最初的新聞便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客觀、公開、關心（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群眾利益、接近群眾的基礎上。充分彰顯其黨性及其所謂“真實性”的立場。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列寧在萊比錫創辦第一份共產主義報紙火星報(Искра)，第一份真理報則出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後來真理報成為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史達林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基本上是延續馬列思想，但他更進一步將傳播媒體的控制與經營權集中於中央。自一九二〇年代末至一九三〇年代初，蘇聯的傳播媒體更成為史達林個人的權力工具。在他執政時期，由於受制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新聞從業人員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樣，不論在新聞的內容或報導風格上都不得不與黨的意識型態妥協，甚至免不了對黨領導的人身加以歌功頌德一番，而這種對領導神格化的時期一直持續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過世為止。此外，公開不僅成為強化官僚體制的工具，也是消滅政治對手、鞏固政權的一個藉口。史達林就這樣成功地操縱媒體來排除托洛斯基、布哈林等異己。

赫魯雪夫執政後開始了所謂的「解凍」時期(оттепель)，赫魯雪夫主張媒體是打擊工人階

級主要敵人的意識武器，但應摒棄過去史達林時期慣有的政治口號。他認為報紙應跳出過去凡事均依一定形式來寫的窠臼，報導的內容應提供更多樣化、更有深度的資訊²。一九五六年新聞記者工會成立，致力於振興新聞專業，並鼓勵會員政治自主、勇於直言。同年設立報紙機關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主要出版更生動活潑而非陳腔濫調的報紙。儘管赫魯雪夫的改革無法改變由史達林所建立的媒體與黨、政府的基本關係，他仍大力鼓吹各種批評與不同意見以改善蘇聯體制的運作。但是他的改革對其他同僚顯然太急遽，一九六四年他被迫下台，而他的解凍政策也在一九六六年宣告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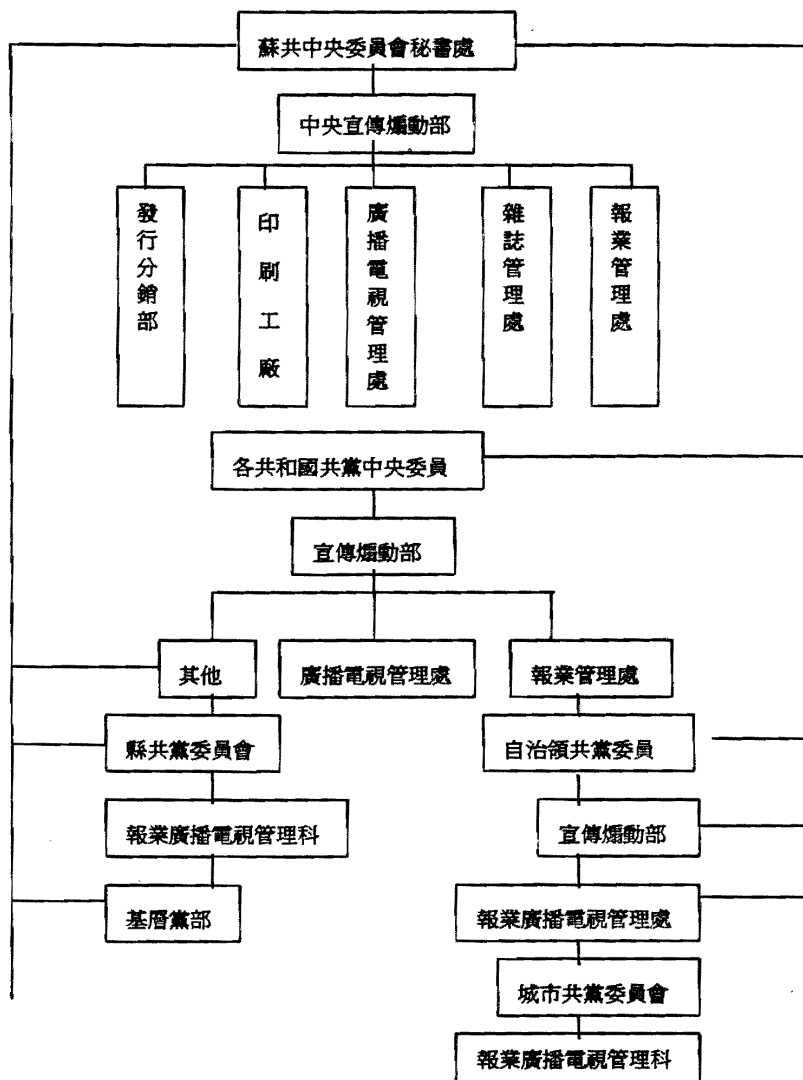
布里茲涅夫主政初期（一九六四—六七年），傳播媒體仍享有某些自由而不必刻意讚揚黨國元首，此時可稱為第二解凍時期，媒體受到溫和的意識控制，因為此時布里茲涅夫才慢慢地從同輩中崛起。一九六八年他下令攻打捷克，使他的形象由謙恭轉變為握有實權的專斷強人。從此布里茲涅夫便成為繼史達林之後新的個人崇拜目標。自一九七一年開始媒體便不再享有赫魯雪夫時期所擁有的自主性，尤其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初傳播界完全沒有所謂的公開。

隨著布里茲涅夫時代的結束，慢慢地出現了未經政府檢查的資訊來源，包括地下出版品 (*самиздат*)、錄影帶、外國電視電台的廣播，再加上人民與外國的接觸機會增加，尤其在電腦及科技資訊引進蘇聯之後，政府已無法像以前那樣控制資訊傳播。

蘇聯傳播媒體的結構與功能

蘇聯傳播媒體的結構與功能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便已確立，唯一有出版權的是蘇聯共黨的各大小附屬機構（從中央委員會到地方黨委會）、國家政府組織（從最高蘇維埃、中央各部會機關到基層的地方政府組織），及官方的公共機關（如共產主義青年團 [*комсомол*]、國家運動委員會等）。也就是說，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蘇聯境內沒有任何獨立出版公司。地下出版品從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最為興盛，是布里茲涅夫時期可與政府不實的宣傳資訊相抗衡的重要資訊管道。

² Brian McNair,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41-42.



上圖為蘇聯共黨管理新聞媒體組織系統表（來源：李瞻，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1982，頁159）

為了確保黨對媒體的有效控制，蘇共中央委員會設有文化與宣傳部門，其中文化部門負責監督管理電影、藝術與創作事務，而宣傳部門則監督管理出版、印刷、電視與廣播、宣傳與煽動、政治教育、報紙雜誌等事務。從黨中央到地方黨部主管傳播媒體的部門就這樣地形成一個嚴密層層控管的金字塔。³

³ 李瞻，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1982。頁158-59。

根據列寧的指示，蘇聯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是宣傳、煽動與組織。蘇聯共黨對於「宣傳」、與「煽動」的區別是以 Плеханов 所下的定義為依據：「一個宣傳人員提供一個人或少數人許多觀念，而一個煽動人員僅提供一大群人一個或少數幾個觀念」⁴。所以蘇共的宣傳主要是針對社會中較前衛的知識份子，如各行業的領導人物與任職官員；而煽動則是教育一般群眾認識共產精神的主要工具。簡言之，革命初期媒體的主要任務是煽動；史達林執政時期則是組織：全國組織在一個「英明的領導」之下，動員全民開始工業化與集體化；自一九六八到八五年以來，媒體的主要工作則是宣傳。政府藉著宣傳手段提供人民少量的真相以建立虛構的美好社會主義建設遠景，儘量減少資訊的可信度，代之以抽象的道德教育、教條及文字技巧的把玩。

由於受到政治及意識型態上的嚴密監控，媒體完全以服務黨為目的。掌控媒體的主要機構是書籍出版總局(Главлит)，負責控制監督所有出版品、廣播、電影及電視內容；未經書籍出版總局核可蓋印者不得出版。此外，還有各級黨的組織，嚴密控制出版物的內容、政治傾向與意識型態。黨對資訊內容及分配的控制分：

- a) 意識型態/政治控制；如透過黨（各級）組織的訓練活動。
- b) 技術（層）控制；透過 КГБ、檢查人員、警察等。

除了黨的層層監控之外，另一個造成媒體只服務黨的原因是一般人的懦弱本性—擔心遭解僱而無法找到相同的職務，這種情形在各行各業都普遍存在，只是在傳播界尤其明顯。媒體自我檢查的現象遍佈全球新聞界，但在蘇聯此一情形尤其嚴重，其主要關鍵在於黨員的自我戒律、自上而下的從屬關係，與其它黨規的要求。此外，報社的組織結構、人事任命皆由黨安排（幹部必為黨員），如果對黨的忠誠度不夠，隨時有遭解僱之虞，但在蘇聯換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無論在哪裡都受到黨的監督控制。

外有小自地方大至中央委員會的嚴密控制，內有新聞人的自我檢查，再加上得不到觀眾真正的回應，媒體逐漸成為中規中矩的政令宣傳者、政府的傳聲筒。

⁴ Alex Inkles, *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 1951, p.39.

「改造」(перестройка)、「公開」(гласность) 與戈巴契夫

七十三年蘇聯政權並非真正完全一致的政府組織，其中有奠基於恐嚇、畏懼及絕對服從的史達林時期，也有相當溫和開放的布里茲涅夫時代（尤其在他主政初期）。自赫魯雪夫在共黨第二十屆大會中嚴厲譴責史達林的殘酷暴虐統治之後，舊有的恐怖政治便不可能再恢復了。經由或多或少的「公開」(гласность)，民意的覺醒已悄然開始。⁵

當布里茲涅夫政權結束時，蘇聯和其他國家一樣面臨全球資訊革命可能引起的威脅。數十年來蘇聯資訊與宣傳的傳遞分配完全由共黨中央控制決定，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官方的資訊來源逐漸被其他資訊管道，如進口錄影帶、外國的電台廣播、地下出版品等取代。此外，蘇聯人民也慢慢地有機會與外國人接觸。同時西方領導開始運用全球資訊網對蘇聯及其政策進行反宣傳。在韓航班機遭俄軍擊落及車諾比核能電廠爆炸案之後，蘇聯新聞的可信度便大不如前。

一般認為蘇聯的「改造」(перестройка)、民主化與「公開」(гласность)是由蘇聯共黨所籌畫促成的。然而，更精確地說，「改造」運動是由蘇聯共黨中一群思想最前衛、最有遠見的高層菁英所策劃推動。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後，這群有志一同的黨菁英分子面臨了蘇聯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發展停滯、文化生活困頓、領導階層老邁腐敗與社會氣氛死寂。此時莫斯科的一些傳播媒體，如中央的報紙與雜誌開始鼓吹政治上的「改造」。也就是說，「公開」是「改造」運動最初的動力。⁶

「公開」在許多方面是功利實用，也是最符合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方法。赫魯雪夫曾加以利用來進行所謂的「反史達林」運動，揭露過去執政的貪污腐敗並普及新思想。「公開」對蘇聯人權問題有重要的影響。公開辯論的出現影響西方對戈巴契夫政策的態度，而人權問題在美國的對蘇政策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公開」不僅改變西方對蘇聯領導的看法，也對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重要的影響。

戈巴契夫政權意識到依據馬列主義所建立的政府、社會，乃至於整個社會經濟體系已日

⁵ Mark W. Hopkins, *Mass Media In the Soviet Union*. N.Y.: Pegasus. 1970. p.103.

⁶ Reino Paasilinna, *Glasnost and the Soviet Television*. YL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p.52.

益惡化，因此提出「改造」政策。為了破除、改變這個體系，資訊自由便成為必要的途徑。也就是說，必須解除特定議題的禁令，新聞人員、研究工作者可以查閱檔案資料，開放對領導階層的批評討論，並建立多元的新聞媒體。

在「改造」過程中，各界都有激進的改革者。但不論是支持或反對改革者都運用平面媒體來實現所謂的「公開」，也因此造成一片紊亂。這些人視「改造」為一個在混亂中爭取自身利益的機會，爭相在與自己立場相同的報紙、雜誌發表意見。其中莫斯科新聞報(Moscow Daily News，蘇聯與外國文化關係協會發行，為莫斯科唯一的英文報紙)一反過去的宣傳角色而成為大膽直言、極力支持最先進的改革思想，進而變成蘇聯「公開」最主要的發言管道之一⁷。其他贊成改革的報紙還有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一九九〇年發行量高達三千一百萬份)、消息報 *Известия* (蘇聯中央政府機關報)、*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發行)、*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蘇聯作家聯盟創辦)與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文化部與文化工作人員聯盟發行)等等⁸。至於雜誌方面則有 *Новый мир*、*Знамя* 與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等。這些激進的平面媒體吸引了年輕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政治評論家、科學家與一些政客。而持保守立場的雜誌則有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共青團聯盟的中央委員會發行)、*Современник* (蘇聯作家協會創辦)與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蘇共中央委員會發行)等。大眾傳播在本質上就附屬於政治，其內容自然多少受當時的社會意識影響。因此，「公開」時期的傳播媒體也相當精確反映了這個階段蘇聯的一些政治氣氛。

Paasilinna 認為「公開」之所以成為戈巴契夫「改造」運動的中心樞紐有幾個關鍵性因素⁹：一、對改變體系本身與權力(尤其是人事)結構—從取代所謂的「老人」政權到煽動各地區改革腐敗的黨官僚制度—的企圖心；二、蘇聯人民的「新大眾心理」的產生—從過去被動地接受意識洗腦到意見自由與多元意見(плюрализм мнений)的選擇；三、自由、解放勞工的振奮與科技的現代化—從所謂優秀的機械工程到全面促進工業與經濟各方面的發展。

⁷ Георгий Ватснаже, *Секреты прессы при Горбачеве и Ельцине*.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7, 1992. ст.111.

⁸ Ibid, p.18.

⁹ Reino Paasilinna, *Glasnost and the Soviet Television*. YL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1995, p.58.

前面曾經提及，一九八〇年代貪污、因循苟且的官僚體制每況愈下，上自部分行政領導下至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要求改革，而「公開」就是改革的首要措施。

但是對戈巴契夫及其幕僚來說，「公開」政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有利而實用的必備條件、達成某些目的的手段與在“進步的”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整合力量，而不是民主社會中每個個人所擁有的言論自由權。然而，這個由戈巴契夫倡導的「公開」政策最後卻成為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進而推翻共黨專政達七十餘年的蘇維埃政權。「公開」之所以變成舉足輕重的關鍵，主要是因為年輕知識分子的支持。

「公開」的新聞媒體

由戈巴契夫政府倡導的「公開」可以說是蘇聯的資訊革命。「公開」對資訊政策的影響反映在三方面：

一、批評與自我反省

「公開」的首要目的是恢復列寧所指示的在「積極」與「批評」面作平衡報導。過去只宣揚經濟、社會上卓越成就的蘇聯媒體開始擔負起監督、批評國家政府的責任。蘇聯生活中的各個層面都是批評的對象。即使軍隊與國家安全組織也得接受大眾的審視。根據一份調查，一九八七年真理報、消息報和莫斯科新聞報中有關警察的文章就有二百一十六篇，其中只有六十七篇是正面的報導，有四十篇負面批評，而有一百零九篇則屬持平¹⁰。「公開」初期，經濟的相關報導仍佔新聞的最大篇幅，但不再強調收成、產量的成就進步。到一九八八年批評經濟方面組織功能不彰的比例明顯提高。

二、澄清歷史真相

一九八五年以前的媒體不僅要宣揚國家經濟的成長進步，更要依共黨領導的指示來“編寫”歷史，而「公開」的一大成就便是使蘇聯歷史真相有水落石出的機會。“新歷史”主要在揭開史達林時期的神秘面紗，平反當時的受害者，如：布哈林、托洛斯基等。在發掘歷史

¹⁰ В. Лозяков, *Милиция и пресса*, *Известия*, 9 августа, 1988.

真相的前提下，以前的禁書得以出版，史達林的私生活也慢慢公諸於世。

三、負面報導

「公開」之前的國內新聞完全遵照黨的指示，以勾勒和平、幸福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為原則，所有的新聞都是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在「公開」之前，國內災難少有報導，即使情非得以，也僅以簡短的官方敘述，輕描淡寫帶過。由於蘇聯的媒體並非商業化經營，市場需求低，因此揭露生活黑暗面以滿足閱聽大眾好奇心的災難新聞就沒有新聞價值可言。而蘇聯人民就這樣被剝奪了從災難事件的報導中，追究譴責造成事件的原因及其相關人員，以避免重蹈覆轍的機會。「公開」之後，蘇聯的新聞價值觀與西方愈來愈接近，蘇聯人民對西方的報導方式也愈發熟悉。漸漸地，抗議缺乏蘇聯境內災難報導的讀者投書愈來愈多，而媒體也開始檢討災難新聞確實有改善公共服務品質、減少缺失的功能。

蘇聯社會學家 Кагарлицкий 指出，自一九八六年車諾比核電廠爆炸案的相關報導之後，「公開」才由一個政府的口號真正地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¹¹。從此災難報導在蘇聯新聞中佔了相當的比例，到了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亞美尼亞發生大地震時，新聞媒體立即作完整的現場報導。

「公開」之前所有的貪污、竊盜與其它反社會行為等犯罪報導，唯有與經濟發展主題相關才加以報導。至於暴力、搶劫和強暴等相關新聞則完全沒有。理由之一是蘇聯共黨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和諧安詳的，絕無暴力犯罪存在¹²。而犯罪消息會與媒體所強調的進步、安定的社會情景有所抵觸。「公開」之後，犯罪問題已不再是不能討論的禁忌；新聞報導中常有暴力、勒索、濫用毒品等消息，甚至還公佈犯罪率的統計數字。

除了災難、犯罪新聞之外，「公開」也使記者有報導國內的宗教、街頭抗議、移民等其它政治問題的機會。自從「改造」開始之後，在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等共和國又興起了民族主義，波羅的海三共和國甚至還要求獨立。過去礙於政府的民族政策，媒體不斷強調各民族之間彼此尊重和諧幸福地為馬列主義奮鬥努力。從一九八五年開始，民族主義、種

¹¹ Boris Kagarlitsky, *Perestroika: the dialectic of change*. *New Left Review*, 1988 May-June, p.72

¹² Mark W. Hopkins, *Mass Media in the Soviet Union*. N.Y.: Pegasus. 1988, p.242.

族衝突的問題已不再是禁忌。

後蘇聯的傳播媒體

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儘管以前黨的行政機構已改弦易轍，實際上權力仍握在同一批人手上。最先受到「公開」影響而變得多元化的是報業，然後是雜誌、期刊，只有電視仍受控於 Гостелерадио¹³。由黨操控的報紙、雜誌，如；Правд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等報的讀者、訂戶驟然減少。因此蘇共只好更加嚴密地監督管理尚未失控的電視。

一九九一年俄羅斯的總統選舉就是明顯的例子。五位候選人雷日可夫(Рыжков)、巴卡汀(Бакатин)、季李諾夫斯基(Жириновский)、馬卡肖夫(Макашов)與葉爾欽中，在戈巴契夫的授意下，電視新聞報導將焦點放在雷日可夫上，把戈巴契夫的勁敵葉爾欽當成陪襯人物，甚至盡可能地忽略他。然而大選最後的結果，葉爾欽獲得百分之五十七的選票。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的政變也是如此。當莫斯科的街頭出現坦克與武裝部隊時，成千上萬的電視螢幕卻播放著完全無關的節目，民眾對於當時發生的事毫無所知。

因此，過去黨管電視並不像報業那樣逐步地轉變成開放自由的立場，而是急遽瞬間的。精確地說，蘇聯電視媒體的「公開」歸功於八月政變。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位總統達成協議結束蘇聯政權，也間接地改變蘇聯統一的電視體系。每個新的獨立共和國都希望擁有自己的電視廣播。一九九〇年代初電視頻道的分配為：第一頻道—繼承 Гостелерадио，改名為 Останкино（全名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елерадиокомпания "Останкино"—РТТО），其訊號遍及所有前蘇聯地區；第二頻道—RTR（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еле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ая компания），幾乎全蘇聯都能收訊，不過其它獨立共和國還加播自己的節目；第三頻道—收訊以莫斯科及周圍地區為止；第四頻道—播放獨立電視頻道(Канал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的節目；第五頻道—聖彼得堡電視台，訊號可傳送到俄羅斯北部，收視戶達七千萬；第六頻道由商業電視台 Москва 所使用。

¹³ Гостелеради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ю) 成立於 1970 年。

蘇聯解體之後，第一頻道變成獨立國協的節目播送頻道，第二頻道仍為俄羅斯的頻道，其餘頻道則維持不變。值得注意的是，各頻道在經營管理與節目內容均為獨立。唯一維持中央統一的是部分的技術與工程設備（從攝影器材到電視訊號發射台）。蘇聯新聞媒體的獨立過程與共黨退出政治舞台有極大關係，俄羅斯總統下令禁止共黨的組織活動，進一步地促成新聞媒體團結，摒除外來的行政干預，確保節目內容的多元性。

不過這個外在改變並不意味從此媒體可以真正發揮傳遞訊息的功能。過去黨機關、檢查制度的控制，現今由市場取代。由於一般物價上漲，紙張價格與印刷成本提高了百十倍，再加上報紙雜誌配送的費用高漲，造成報紙雜誌的價格上揚到一般消費者無法負擔。最後導致平面媒體的經營幾乎無利利潤可言，只好大量減產，例如：雜誌 *Огонёк* 一九九二年中虧了六百萬盧布，報紙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銷售減少了十二倍，而真理報更減少了二十倍。¹⁴

平面媒體在面臨這樣的經濟困境，只好向政府尋求資金補助，如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便成為政府的代言人。至於那些不迎合當局的報紙，只能在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自生自滅。同時，國會中一些新共產黨員的保守勢力開始抬頭，在「改造」過程中影響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消息報便成為他們覬覦的主要對象。以為 *Хасбилагов* 首的國會議員希望消息報變成國會刊物，甚至連總統也十分關心傳播媒體的發展。

總而言之，即使擺脫黨的掌控，報紙也無法影響讀者大眾，發揮第四權的功能，因為流失大量讀者。而這段真空時期便由電視及廣播電台取而代之，電子媒體對社會的影響日益顯著，而這些電子媒體的控制、使用者對社會民意的影響也相對提高。

結論

傳播媒體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當然也和社會的政治、意識型態息息相關。在蘇聯的體制下，黨的政策命令、對新聞的監督管理、以及主導的意識型態等等，在在都是決定因素。如果不是戈巴契夫政府在一九八五年推動「改造」運動、實行「公開」政策，過去那種由 КГБ

¹⁴ Reino Paasilinna, *Glasnost and the Soviet Television*. YL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1995, p.64.

機關極權控制、蘇共教條宣傳的情形可能仍持續至今。「公開」可算是整個「改造」運動最主要的成就。也正是因為「公開」政策，引發各個共和國尋求獨立，最後導致整個蘇聯解體。在長期封閉壓抑的社會中，一但閘口打開之後，「公開」就像洪水決堤般氾濫，而衍生出許多問題。

戈巴契夫當初提倡「改造」是希望在蘇維埃的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改革，最終卻造成社會經濟結構瓦解。但是政府當局卻無法及時地擬定出一套經濟改革計劃，以至於從一九九二年來全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而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軍隊的糧餉遲遲未發、老人的退休年金長期積欠，一般人民陷入貧困生活。由於「改造」運動缺乏一套有效的解決政策，「改造」之後非但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紊亂。

一般俄國人在接受了七十年蘇共的教條宣傳洗禮之後，對於主政者是誰已不再關心，但求保障溫飽。過去居「公開」領導地位的報紙，在經濟因素之下已喪失其社會“先知”的角色。群眾資訊的來源漸漸由取得容易的電視、收音機所取代。而作為資訊解放、保障人民有知的權利的「公開」，反而失去它最初的意義。「改造」之後的政府組織並無真正民主之實，導致更嚴重的民不聊生。主要的資訊管道仍然掌控在執政的少數人手中。七十年蘇聯共黨的思想教育並非一朝一夕的改革就可以扭轉。「改造」與「公開」直接或間接地促使蘇聯解體，但是「改造」後的傳播媒體是否真能促進俄羅斯的民主、自由，甚至經濟成長，顯然有待更進一步的長期觀察。